



2020年是张爱玲（1920—1995）百年诞辰。在世人眼中，张爱玲是一个神秘的存在。异国漫长年月的幽居避世，让她活成人们心中一座深锁的孤城。而本文受访者王禎和，曾与张爱玲有过一段难得的文学渊源。那是1961年，41岁的张爱玲应香港某影业公司的邀请创作电影剧本《红楼梦》，顺道去台湾收集资料，因此结识了当时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王禎和。张爱玲对王禎和的小说《鬼·北风·人》十分赞赏，遂对其家乡台湾花莲的风土人情大感兴趣。王禎和于是特向学校请假一个礼拜，负责张爱玲的饮食起居及花莲导游工作。多年后，王禎和接受台湾《联合文学》记者丘彦明采访，忆及与张爱玲相处的一些片断，读之有惊鸿一瞥之感。

相见不如怀念 ——忆陪张爱玲逛台湾

口述 / 王禎和 整理 / 丘彦明

张爱玲出现了，大家眼睛一亮

丘彦明（以下简称“丘”）：张爱玲是公认的中国文坛重要人物，而她的生平少有人知，除了她自己在《流言》一书中所写的几段，其他数据实在少之又少。因此，不论如何，我们希望你能够提供一些张爱玲在台湾的数据。毕竟，那是她到台湾唯一的一次。

王禎和（以下简称“王”）：张爱玲来台北，在台北国际戏院对面餐厅和殷张兰熙、白先勇、王文兴、陈若曦、欧阳子、麦加锡（“美国新闻处”处长）夫妇以及我见面。张爱玲到台北，暂住麦加锡家里。那是一幢在阳明山公园附近巷子里的大别墅，仆从如云。

张爱玲与麦加锡夫妇抵达餐厅之前，殷太太说：“我们都没见过张爱玲，大家来想想她是什么样子。我问麦加锡先生，他说张爱玲很胖很邋遢。究竟有多胖多邋遢？”我们一听都很失望，不愿再想。

这时，张爱玲出现了，大家眼睛一亮。哪里邋遢？干干净净的，而且一点都不胖，虽然不是顶漂亮，却是“可看性”很高。

丘：什么样的机缘，张爱玲来台湾会和你们见面吃饭？

王：那一年我是台大外文系二年级的学生。

白先勇等人办《现代文学》杂志。麦加锡很喜欢文学，他选了白先勇、王文兴、欧阳子和我的小说各一篇，请殷张兰熙翻译成英文，书名为《New Voices》。这本书当时正在翻译中，张爱玲与麦加锡是老朋友，来台湾，他就安排我们吃饭见面。

丘：那晚张爱玲谈了些什么？她说话时什么样子？

王：她很少说话，说话很轻。讲英语，语调是慢慢的。

丘：什么因缘，张爱玲到花莲一游？

王：她读我的小说《鬼·北风·人》，对里面的风土人情很感兴趣，特别写信给麦加锡希望到花莲看看，所以麦加锡先生就联络了我。我们那晚在国际戏院对面聚餐之后，第二天就出发了。



1961年10月15日，张爱玲（中）与王禎和及其母亲合影





丘：能否描述一些花莲游历的情形？

王：去花莲途中，在一餐厅用饭。隔我们几桌之外有一张桌子，围坐了七八个妇女。她看了一会儿对我说：她们大概都是小学老师吧！我看了一下，觉得她推断得很有道理，因为那几位女士穿得很朴素，却又相当活泼。

我带她游花莲市，在街上逛，后来走到陋巷，碰到妓女户（妓院——编者）小姐在店里跳曼波，她觉得好有趣。于是，第二天在我四舅父安排下，引她一游“大观园”（一甲级妓院名称）。她看妓女，妓女坐在嫖客腿上看她，互相观察。她的装扮，简宜轻便，可是在1961年的花莲，算得上时髦，又听说她是美国来的，妓女对她比对嫖客有兴趣。

丘：你刚才提到张爱玲的装扮。张爱玲自己对服装特别注重，从她的文章及图画都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。你能不能就记忆所及，更详细描述她的装扮？

王：因为是旅行，她穿的衣服很轻便，都是很舒服的衬衫。她很习惯衣服上第一、二个扣子松开不扣。这在1961年穿衣服还十分保守的台湾来讲，相当特别。我舅舅用台语对我说：“伊像美国人，很美国派。”非常有趣。

丘：在花莲还去了哪里？

王：我带她去了花莲最古老的城隍庙。进门庙柱上有四副对联，从右至左：一，阴阳原有别到此地饶舌何庸；报应本无差愿汝曹抚心自问。二，城郭固而高善事几重皆得人；隍池深且广恶人一个不能预。三，具广大神通别是非岂遗分寸；秉聪明眼力判善恶不爽锱铢。四，夫微心愿不爽毫厘；惟神则明无惭衿影。

她看了半天，然后很欢喜地说：“我知道意思了。”我不知道她究竟从中间“悟”出了什么。

看到城隍庙里的白瓷砖，她说：这倒是浴室。

隔天我们到乡下整个上午、下午，她边看边做笔记，说了一句“台湾真富”。

丘：可否举个“张爱玲式”的小例子，更明确地表现她说“台湾真富”这句话的感触？

王：到花莲途中搭公路局汽车，每到一个小站车都要停下来。沿路以及车站到处都是可以做圣诞树的松树和扁柏，还有各种稀有的树和花，她说：

“台湾真富，这在美国都要花钱买的。”

丘：张爱玲到花莲，暂住你家？

王：我们家开杂货店，店铺和住家一起。住家的街道不宽，邻居都很好奇，说我带女朋友回花莲。她那时模样年轻，人又轻盈，在外人眼里，我们倒像一对小情人。在花莲人眼里，她是“时髦女孩”，因此我们走到哪里，就特别引人注目。我那时刚读大二上学期，邻居这样看，自己好像已经是“小大人”，第一次有“女朋友”的感觉，喜滋滋的。

我们打扫出楼下的一个房间让她住。她会说话，跟母亲就用点日语相谈。她每天晚上跟母亲用日语道晚安。她说话很慢，很柔，很自然。

晚上睡觉前，她一定在脸上擦各种水，各种不知道什么的油脂，用一张张卫生纸擦啊抹的，当然也花很多的时间。我母亲看见很好奇，也觉得新鲜，用台语告诉我：“不知是什么东西？”10月15日晚上，我们约好到照相馆拍照，她花了一个钟头以上时间化妆。那天，照相师很认真地替我们拍了很久。

避而不谈个人写作

丘：你们有没有谈文学，她的小说？

王：我们很少谈文学的事。她不大愿意谈自己。我说她的小说真好，每个字都有感情，掷地有声。她说：“不要说。不好，不好。”

张爱玲的小说，乍看写的像是小事，其实是很世界性的，一个时代就出这样一个作家。

我本来很想学她，但是学不来，只好放弃。像李白的诗不能学，杜甫的诗可以学，一样的道理。后来她出书《红楼梦魇》，请皇冠出版社送一本书给我。没想到她研究《红楼梦》这样深，什么程乙本、程高本的，我从头读到尾，看了还是不懂。她是下了功夫，不容易，很了不起。

她的小说我一次又一次地看，现在看还是好。我有时候会想，她的《秧歌》写得太好了，她是观察那么敏锐的人。

丘：当时她完全没提到自己的写作计划？

王：她说，写了个长篇小说，是用回忆的方式写的。不过回忆的部分太长了，“现在”的部分





只在前面占一点点地位，显得不平衡，她要再改。这个长篇，是不是指《半生缘》？我不能确定。另外，她准备以伦敦做背景，写长篇小说。我问她，要不要以台湾为背景写小说？她说，不行。台湾对她是 silence movie（默片），因为语言的隔阂。

丘：她有没有提到白先勇等人的小说？

王：我陪张爱玲去花莲旅行时，奉白先勇之命带了一套完整的《现代文学》杂志送给她。张爱玲说她行李多，她沿路把杂志看完再还我。

我还记得她在我家，边捧着木瓜用小汤匙挖着吃，边看《现代文学》，神情模样那么悠闲自在。25年过去，那姿态我居然记得那么清晰，觉得她什么都好，什么都美。

她读过金恒杰（台湾法国文学研究者、作家）的一篇说自杀的小说，主角吃了很多颗安眠药却没死。后来，在花莲我家，她胃肠不好得吃药；她说，她想起金恒杰的小说，怕药房里的药是假的，不敢吃。后来我舅舅骑脚踏车，她坐后座，带她去医院诊治拿药。

丘：还谈了些什么小说的事？

王：由丁玲谈起，后来说到大陆的小说。她说在大陆，都是按一种“formula”（程式化）来写作，不会有好东西的。

她谈起她丈夫赖雅，说他是西部武侠作家。他们隔壁也住一位西部武侠作家，写过《独眼侠》（One-eyed Jack），在家里就曾拿枪射猫。

她说《春江花月夜》这出舞台剧很新，也谈原小说。她跟我说起田纳西·威廉斯（美国剧作家）曾喜欢巴里摩戏剧世家中的黛安娜·巴里摩，她是当时美国舞台红演员。好像威廉斯为了她还酗酒。她还译过海明威等人的小说，可见她对文坛的情形不是封闭的。

丘：她还提到过其他文坛上的人士吗？

王：她对胡适之很敬佩，认为现代的中国与胡适之的影子是不能分开的。

丘：后来她译《海上花》，

就与胡适之有很大的关系，她自己在文章中也曾提到。她有没有提到自己的电影剧本写作？

王：她只谈到接着要去香港，为电影《红楼梦》写剧本。后来这剧本没有拍。她讲：他们要的是少男少女的戏——电影界喜欢少男少女的戏。

丘：请你再仔细回想一下，张爱玲有没有说过她写作的任何一点习惯？

王：她说她写作先用英文写，用英文写得很慢。她说：“我中文写得很快的。”只要提到她的写作，她总是轻描淡写，避而不谈。

“相见不如怀念”

丘：我们再把话题回到旅游时的人、事上吧！从你前面的描述，感觉上她是很自然亲和的人。

王：我们从花莲到台东之前，她一定要买礼物送给我舅舅，问我什么比较好？我说舅舅没缺东西。她说，A man has everything（什么都不缺的人）是很难买礼物的。我们上街到一家书店，她和老板用国语交谈，讲着讲着就变成上海话了，聊了很久。终于她买了支钢笔送给舅舅，舅舅很少写字，后来把这支笔转送给我用。

离开花莲时，她在我们家留下一双鞋，样子很像现在的拖鞋，我母亲很喜欢，每天穿来穿去。

搭车从花莲到台东，利用等车的时间，我们在街上走了一下。她买了一个小木盆，放进随身的袋子里，说：“大陆习惯出门要带一小木盆。”

我们在街上还看到“跌打损伤”的小摊，以及其他一些草药。卖药郎中看她身体不太好，介绍她买药，她不敢。她说，很羡慕麦加锡身强体健，可以到处旅行。

丘：离开花莲，到了台东之后呢？

王：我们搭车到台东，一下车，站长就来找我们，说“美新处”到处找我们，打电话过来，要张小姐立即与他们联络。原来她丈夫赖雅中风，家人打



张爱玲和丈夫赖雅





电话找她。我们只得取消行程。

她于是去打电话。那时打电话，投了钱之后要接线很久才可通到话，公共电话后面有两个人排队等着，张爱玲转身很善意地不急不躁对那两个人说：“你们去那边打电话。”一只手提着电话筒，一只手指着另一个公共电话的方向。

坐夜车回到台北，我和她挥手再见，看车子向阳明山方向驶去，心里非常难过，仿佛不能再相见了。

麦加锡夫人后来告诉我，张爱玲回到阳明山了解赖雅的病况之后，情绪 very upset（心烦意乱）。但是那时她若回美国，钱只够买票到洛杉矶，回不到波士顿，会变得 stranded（进退两难）。所以，她确定赖雅情况稳定后，还是依原计划到香港写《红楼梦》电影剧本，写完剧本再回美国。然后，她亲手照顾丈夫，直到他去世。这些情形，是后来从张爱玲的通信中知道的。

她回美国之后，为《The Reporter》杂志写了一篇文章，题目叫《A Return to the Frontier》（回返边疆），寄了一份给我。作家水晶看了题目有意见，说：“怎么能说到台湾是‘回返边疆’呢？”文章中提到臭虫，水晶又说：“怎么可以说台湾有臭虫？哪里有臭虫？”我本来看这篇文章觉得没什么，写得很好啊。但是受了水晶的“爱国刺激”也引起了反应，觉得要跟张爱玲抗议一下。这时恰巧作家徐訏在《联合报》副刊写一篇骂她的文章，我寄剪报给她，顺便抗议“臭虫事件”。她回信淡淡地写了一句：臭虫可能是大陆撤退到台湾带来的。

丘：之后，你们一直有消息往来。真没再见过面？

王：一直有通信。我去当兵时，看到相思树、相思豆，也写信告诉她。看到她写的剧本拍的电影，打抱不平说导演怎么能拍成那个样子？她置之一笑。

毕业当完兵，我到国泰航空公司服务，有机票可以免费去美国。我写信给她，说要去波士顿看她。她回信说，欢迎我去，不过她家比较小，安排我住旅馆。

那是我第一次出国，什么都不懂，也没找朋友，去到纽约，拿着地图迷迷糊糊地找不到巴士站，很着急，打电话又打不通。后来我写信给张爱玲，她

回信说，等了我一天，第二天头痛了一日。

这次没见到面，我后悔至今。几年之后我去爱荷华，她已搬到洛杉矶。我写信希望见她，她已不见我，回信：“相见不如怀念。”

当然，她住洛杉矶我是找得到她的，因为她住的地方是庄信正（台湾文学评论家）帮她搬家的，她的房东对她很感兴趣，她一直躲。我后来到洛杉矶就暂住庄信正家。我想了想，还是尊重她的决定，把要送她的花莲大理石托庄信正转交。

丘：与张爱玲的这一段“文学因缘”，还有什么值得记忆的？

王：有一天谈到小说，她说：“我们的小说都不去分段，都是长长的。”“我们”这两个字让我“受宠若惊”。

她还曾提到，从广州坐火车经深圳到香港，民兵检查她时，她很紧张，因为护照上用的是笔名。民兵问她：“你就是写作的张爱玲？”她很紧张地答“是”。那民兵就让她出来了，没有留难。

丘：与她的交往，你是否受了些影响？

王：我这一生有三件事受她的影响很强烈：

第一，是讲国语。她说，你们福建人“f”音和“h”音好像分不清。从此以后，我再次遇到要发这两个音时，会特别小心，不希望有错误。

第二，我以前说到“噱头”两个字，“噱”是读“ju”。她说：上海人是念“xue”。从此以后，遇到没念过的字，我一定要先查字典才说出来。

第三，我们看山地人结婚喝酒，我说：“他们表情很忧郁。”她听不懂，我改用英文说“忧郁”就是“sad”。她说：你讲话很文艺腔。自此，我讲话，一定小心避免掉“文艺”的字眼。

丘：从这里更可以感受到张爱玲的真实无饰，以及观察事物、生活的敏锐。

王：真是奇怪，我真的能把关于她的每一件事，每个动作，说的话都记得清清楚楚的，包括她喜欢戴的大耳环……

丘：我想张爱玲看到这篇访问，感觉会很温馨的，像一幅油画，年代越久远，里面的线条、色彩，越清晰地浮现出来，带回往日的美丽，停伫成永恒。

（责任编辑：叶筱）

（邮箱：wind.0116@163.com）